



返乡记

# 把所有的响亮，都给寂静的村庄

□ 杜佳冰文并摄

小时候除夕那天，村子的土地庙前会有人打鼓，祈福来年的土地丰收，牛羊牲口杜实。

但这一年的除夕静悄悄。我们几年没回老家过年，哥哥想打鼓的心被奶奶压制了一整天。她小心地警告，胡同里有几家患了重病的人，“不要制造响动，出那个风头”。

上午，村里按习俗集合男丁去上坟，之后挨家挨户拜年，有时候会留下来吃饭——这是奶奶最紧张的事，她已到了为备几道菜而慌乱的年纪。我遵照嘱托，准备好瓜子糖盒，在男人们上坟回来之前，把6个格子装得平平满满。我们小心翼翼等待着，敞开大门，最终只来了一位伯父，他

□ 傅 瑞文并摄

因为工作，我大年初四才回家。根据“相亲相爱一家人”的群聊记录，年夜饭的餐桌上有鸡有鸭有鱼有蟹，唯独没有我。那几天，我想念家乡饭菜的每一秒都像过了一年。

我是杭州人。回家前，我听一位网友说，如今在杭州的一些农贸市场，杭式熏鱼可以现杀现炸，感觉就像“小时候爸妈做饭，我把菜从锅里夹出来直接吃”。

网友描述的菜市场，家的温馨和饭菜的香沁在一块儿，让我思乡。

杭州冬季室内比室外冷。北方人拥有暖气，南方人打颤3分钟、保暖两小时。“冷了多穿，开什么空调”“开26℃就够了，别开到28℃”，父母“贴心”的叮咛促使我出门，寻找网友说的美味。

“采荷”农贸市场扎在一堆居民楼里，开了两个单元门大小的入口。正月初五的午后，阳光晒得人懒洋洋的，菜市场门口，人们谈笑。

我印象中的菜市场，是一个充满吆喝声的血腥的地方，那里有把鱼拍至深度昏迷的青石砖和剪断鸡脖子大动脉的锈剪刀。我最怕角落半透明、半人高的活禽放血塑料桶。

初五这天，我眼前的景象很现代文明。菜市场铺着灰色的地砖，蔬菜按照品种和形状错落有致地堆放在摊位前。水产铺老板不停地打扫鱼鳞，肉摊把美颜打光的“嫩肉红砖”换成了普通的日光灯。没有污水，没有异味。

网友说的熏鱼找到了，一碗48元，不便宜，还得排队，摊主是一位中年寸头大叔，戴着帽子、口罩和手套，站在滚烫大的油锅前，用搵滚黑豚推销。“你吃一

专程回村里上坟，几句寒暄，就说要回城里过年，没留下吃饭。

客人走了，我们松了一口气，却觉得有些空荡荡。没什么事要忙，我坐在炕上看手机，爷爷就拿着他的手机凑过来，催我“瞧病”。我是爷爷奶奶的手机医生，包教包会包维修，报酬是把他们看视频赚到的红包提现到我的账户——那是他们兢兢业业的日常，即便悉数上交，也笑意盈盈，放下心来。等过完年，村里又找不到几个能帮他修手机的年轻人了。

年夜饭很是丰盛，但爸爸请来几位同村的长辈和我们一起吃，使这顿饭的氛围不算亲切，也不红火。如果仅是自家人，说说笑笑倒很放松。宗族里的人我虽不熟，但要是来得多，像小时候那样挤满一间屋子，要想拿瓣橘子放火炉上烤着吃，

都得在大人的腿之间钻来钻去，那样也很热闹。像这样不多也不少，反而冷清又拘谨了。饭桌上，几个男人鼓起兴致举杯碰酒，又不自觉地失落下来，互相叹：“哎，村里没人了吗？”

天色暗下来，眼看着这一天就要结束了。妈妈和厨房缠斗了一天，洗完碗，又洗完自己，终于上床休息了。哥哥仍盼着外头的响声，烟花爆竹的声音远远近近，他兴致不高，直到临近零点，依稀有了“咚咚咚”的节奏，是鼓！

他一骨碌爬起来，胳膊还没穿进外套里，脚已经在踩鞋子，嘴上催个不停：“快快快！”“等我涂个护手霜！”我一抬头，他已经冲出去了。

天冷得透彻，星星格外明晰。土地庙不远，有人燃起了火堆，一块硕大的老树

根架在火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烧完。火堆前面就是大鼓，拿鼓槌的是以前的老村长，村里最能张罗事儿的人，他手掌节奏，拍镲子的人盯着他的手，起落附和。

南边北边的人都听着鼓声赶来了。深夜里，女人们围着火，男人们围着鼓，土地庙门被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挤满了，排队等着烧新年的第一炷香，尽管庙里供的神像管的是土地和牛羊牲口，而他们不再耕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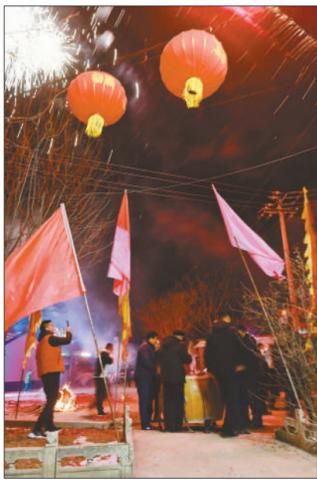
零点或许是临近了，鼓声又起来了。几个男人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双手，狠命地敲打着。那声音仿佛能斩断什么，但又不似刀那样锋利，而是像锤，钝钝地落下来，笨拙而彻底。

转眼，烟花升起，将鼓的声音掩去了。鞭炮一齐点燃，“轰隆隆”“砰砰砰”，人们用

尽全力，制造出最大的声响，却一点也不觉得吵闹。我抬起头，看见红灯笼在黑夜里摇摇晃晃，旗子飘着，烟花升起，绽开，四周仿佛无比静。那些有关病痛、孤独、贫苦、迷茫的心事，这一刻都暂停了，人们都咧着嘴。我想，响吧，把这一刻所有的响亮，都给寂静的村庄。

我想起一个夏夜，我和奶奶坐在院里，眼前突然升起好大的烟，像一条白色巨龙往北边升腾去，弥漫了半边天。奶奶说，只是对面的奶奶在烧炕而已。她独居着，人很瘦小，又一年比一年蜷缩。这炕洞里升起来的烟，或许是她能造出来的最大阵仗了。

炮烟散去，我们踩着红色的纸皮回家。爷爷摘下帽子，挂在门上，笑着释放了一口气，我才发现他连外套也没穿。



2月9日，除夕，西北某地的村庄，村民在欢庆春节。

返乡记

# 菜市场是万花筒，让我看见东南西北中



小黄来自四川，在杭州的菜市场经营肉铺，大年初一就开张营业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傅瑞/摄

口，你现在就吃，不好吃你退给我，一分钱都不要。”

我颤颤巍巍地咬了一口，现杀的嫩鱼块裹着鲜甜的酱油醋和香葱，每一根鱼刺都被炸得酥脆，真有围在锅边吃的感觉。

这天，我又去了本地网红“文二菜市场”。经理徐峥晖说，市场去年10月开

始，一边翻新，一边投入经营，整个重建工作的进度还没到一半，就火了。

它坐落在居民楼边上，抽象的logo展现出它超越寻常菜市场的决心。门口摆着玫瑰、月季、百合、凤仙、芭蕉、铁树……我这个近视眼看了两眼，果蔬和鲜花绿植融为一体，冬日里的菜市场看上去像是春天

的花卉铺。

菜市场拥有毕业于中国美院的主设计师，场景布置、灯光色温，都进行了细致规划。为了成为“网红”，一切早有预谋，比如“灯统一用3500K色温，拍出来的照片好看”。

呼应龙年的彩龙装饰，凑近了看，鳞片是西瓜、山竹、百香果、猕猴桃等水果的切片造型。藤制的细密格栅让光线投到地上时形成格子影。为了还原南宋古都的质感，熟食店都用木质菜牌。所有摊位不允许出现塑料袋，蔬菜需要按品种、形状整理排队——要让客户身心愉悦。

徐经理今年52岁，杭州人，打算利用退休前的8年时间“干票大的”，要把菜市场、美食、咖啡和美学连在一起。

他戴黑框板材眼镜，梳着背头，和我聊天时，摩挲着左手无名指上的黑碧玺戒指，像个青年“潮男”。他介绍，菜市场1999年建立，此前，这里都是地摊买卖儿，连个屋顶都没有。随着当年杭州“退路入市”政策的落实，原先的装饰材料厂搭上临时大棚，成了文二农贸市场。“当时觉得有个顶就很好了。”徐峥晖说，现在要彻底改变商户的习惯，得一家一家上门沟通。绝大部分商户不明白为何要把瓜果摆好看，他们不愁销路，觉得“卖出去就完事儿”。

“要和市场风格相融合，要和时代相称。”徐峥晖一遍又一遍地劝说。

翻新后，A馆开业的时间临近春节，由于文二市场是周边居民重要的“菜篮子”，省委书记、市委书记都来视察过。谈及领导对“保供”的重视，徐峥晖说：“农贸市场这25年来每天都是开着的。”

大年初一，在“文二”摆肉摊的四川小伙黄少勇就开张了。当天，他是市场里唯一一家营业的肉铺，卖自家猪肉的同时，还帮着边上的店家卖牛肉。

“这个菜市场里的商户，只有一家卖甲鱼的能说杭州话，其他都是五湖四海来的。”徐峥晖算了算，六七个保安，来自黑龙江，更多摊贩和工作人员来自安徽、重庆、四川、山东、河南、广东等多个地区，能凑出一盘“东西南北中”。很多人来杭州十几年了，靠双手勤劳致富。虽然来自不同地方，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，但都在这里过上了舒心的日子。

菜市场是杭州的一个缩影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汇集在这里，起步、发展、突破。2006年，杭州有271.81万城区人口，往后8年，人口缓慢增长了约113万；2015年，杭州城区人口在一年内猛增138万，总人口数首次突破500万，跻身特大城市；2022年，杭州城区人口破千万，解锁“超大城市”成就。

互联网经济、数字经济在杭州集聚发展，头部企业不断扩张，更多的年轻人来了。

整个文二菜市场，电子秤都是“互联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张亚云

周六早上7点22分，从唐山出发的D8802次列车停靠北京站，早已在车门口等待的陶佳妍努力将身体前移，第一个迈出车厢，以最快速度穿越人群坐上北京地铁2号线。

她要在8点左右抵达学校，协助老师完成学员签到、递送话筒、维持课堂秩序等工作。

在北京师范大学，44岁的陶佳妍是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，为了“蹭”到学校周末开设的继续教育培训课，她每周通勤，从唐山家里赶到北京，做“实习助教”。

走在北师大的校园里，陶佳妍所遇到的大多数同学，年龄可能连她的一半都不到，这些年轻人的人生刚刚开启，而她正在努力“重启”。

中央财经大学展开的一项调研显示，到2021年，我国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达到39.16岁。像陶佳妍这样超过40岁、通过求职、培训、职业资格考寻求职场“重启”的女性，并不罕见。

## “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家人，没给他们最好的支持”

今年元旦刚过，47岁的卫薇安顶着一头漂染成亚麻灰色的头发，踏进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。像其他20多岁、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实习律师一样，她接受指导律师的安排，起草法律文书，坐在法院的旁听席上听庭审。

8个月以前，她还是一家主营服装零售的外企担任运营总监，忙碌在销售一线。“带过十几人、上百人的团队，我更能感受到领导想要什么样的实习生，那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的事情。”卫薇安说。成为大龄实习生确实令她有点尴尬，但她更难忘4年前的挫败感。

她从小就是优等生，自认为前20年的职场生涯一帆风顺。2019年，她跳槽刚4个月，就被迫离职，一度陷入强烈的自我否定情绪中。

经历人生中第一次失业，卫薇安想不通一直优秀的自己为何“没有接住”，也担心女儿国际学校学费和家里的房贷，“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家人，没法给他们最好的支持”。

她至今记得，白天在父母孩子面前强装镇定，夜里睡不着，甚至产生过极端绝望的想法，曾两次拨打“心理求助热线”。

文献看到深夜两三点，借助药物才能睡着。两个月后，她的月经迟到了。检查结果显示雌激素低，医生安慰她：“如果以后月经不来，你也别太紧张。”

陶佳妍在工作上一向拼命，但这次身体的反应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料。最近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为了上课和当助教，她往返北京和唐山五六十次，为了节约成本住青年旅社，也没觉得多苦。然而，毕业论文带来的焦虑正在超过她的承受能力。

在毕业这件事上，陶佳妍自认为没退路。3年前，她刚入学，因为“课程方向和当初想象的不一样”申请过一次休学。后来，她在丈夫和儿子的鼓励下重新返校，“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，如果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”。

## 她卖了一套房子，还把女儿转回了公立学校

陶佳妍说，5年前，自己还在一家央企工作，文笔出色，受领导重视。由于工作关系，她到访过国内不少城市，也获得过多个奖项，“心气儿很高”。

2018年年初，陶佳妍发现自己怀上二胎。恰逢单位还有两项重要工作，她决定忙完再休息，结果“任务结束的当天流产了”。

陶佳妍辞职了，她重新考虑工作和家庭之间“到底想要做什么、靠哪头”。

真正放松下来后，她又觉得闲不住，“并不是那样的人”。她想着，还是要找一份工作，但不能找和以前一样的。“得找一个更重的砝码支撑自己，一份内心喜欢的工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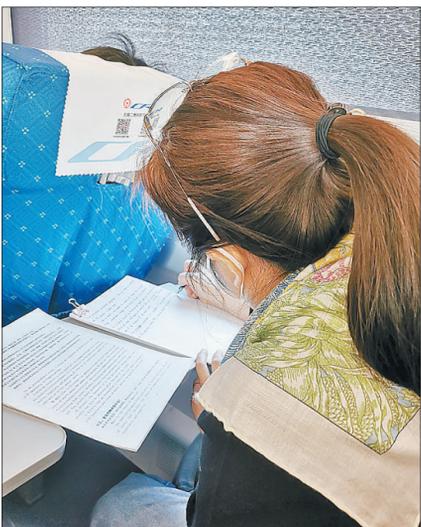
听说年相仿的朋友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，陶佳妍也想去。她的想法获得了丈夫和读高中的儿子的认可，“我之前的经历也给了我底气，觉得可以试一试”。她记得，考研冲刺阶段，自己天天熬夜，执行完学习计划才上床睡觉。

佑洁今年43岁，原本和丈夫在上海工作，丈夫是程序员，她做市场营销。2014年，夫妻俩带女儿迁至澳大利亚墨尔本，丈夫还在编程，佑洁至今已换了3份工作。

没生二胎前，她曾供职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企业。“市场营销在澳大利亚竞争很激烈，当时我的英语还不是太流利，工资相对也比较低”，这份工她打得并不顺心。

2018年，佑洁生下儿子后辞职，在家照顾两个孩子。儿子两岁大时，她开始留意一些招聘信息。

2020年年初，她关注到墨尔本对永



久居民提供免费线上培训课程，佑洁学习并获得了学前儿童护理和教育文凭，随后入职了当地的一家幼儿园，主要照顾两岁以下的孩子，“接送儿子上幼儿园也比较方便”。

那时候，她必须每天6点前起床，7点不到赶到幼儿园开始上班，和其他两名同事共同照顾十几个孩子的吃喝拉撒。除了准备他们的一日三餐、陪伴午睡，每两小时定点换纸尿裤以外，还要带孩子们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、打扫卫生，每天都“接受着心灵和体力上的双重考验”。

孩子们从蹒跚学步到奔跑自如，佑洁内心的“不安分”也在反复涌动。“只要在教室里就停不下来”，每月拿到手的薪水也远远不及澳大利亚的平均工资。

尝到免费培训带来的甜头后，佑洁对相关消息保持关注。一天，一则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为30岁以上人群提供免费数字培训的信息吸引了她的注意。

养育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，让佑洁不敢贸然“脱产”去学习。陆陆续续自学并获得一些证书、通过培训测试后，佑洁才敢再次辞职，接受为期3个月的全职培训。



▲2023年9月，卫薇安在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复习备考。

►卫薇安准备司法考试期间的学习日历，App显示她在凌晨两点多完成当天的任务。

◀2023年11月的一天，陶佳妍在火车上复习研究生英语课程，准备期末考试。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还了，再把女儿从私立学校转到公立学校。托熟人介绍过面试、接触过猎头，2023年8月，卫薇安最终决定重拾20多年前学的法律专业知识。

2023年秋天的大多数时间，她都是在上海普陀区图书馆度过的。她狠心花5000元报名司法考试辅导班，“背了七八遍记不住的知识点，就打字过一遍再背一遍”。要是上午9点多抢不到座位，她会抱怨偌大的图书馆为何“人山人海”，遇到难以消化的知识点，她会在图书馆的走廊和电梯间来回踱步。

卫薇安找母亲帮忙做家务并照顾10岁女儿的日常，她在图书馆待到晚上8点闭馆，再去咖啡厅看书，家人睡了，她继续看，看到半夜甚至凌晨。

在普陀区图书馆外，苏州河静静流淌而过。这座城市的开放、繁华、时髦暂时与这个46岁的女人无关。

## 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做的事情

在墨尔本的一家大型金融企业，佑洁成为IT云计算实习生已经180多天了。没有特殊情况的话，每周两天，她安顿好10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后，都会坐着火车

去市中心的办公室上班。

现在，她对“产品”“环境”“项目”这类专业名词的熟悉度增加了，能独立修改云计算领域简单程序问题，也适应了偶尔与同事们线上加班到夜里一两点节奏。即使尚未真正享受到转正待遇，佑洁觉得，“弹性”的工作方式和自由的办公环境，挺适合家里有小孩的女性”。

这名大龄实习生的转行之路并不容易。澳大利亚法律禁止职场年龄歧视，但佑洁简历上的“工作经历”很清楚。眼下这份工资，是她在3个月密集的培训课程结束后，又投了很多份简历才被邀请面

试的。“培训结束后就能进入这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实习，对我来说是挺幸运的事情。”佑洁解释，澳大利亚的不少企业在招聘时会平衡男女雇员的比例，也试图突出多元的文化背景。但就她所在的小组而言，目前的十几名正式成员，基本都是男性。作为大龄实习生，佑洁还留意到公司有50%的同事。

她眼下最担心自己能否转正。IT行业虽然薪资待遇好，但新冠疫情过后，全球经济面临普遍的增长放缓，相比招聘通知，企业的裁员信息出现得更为频繁。今年，佑洁所在的公司对实习生转正名额的发放变得吝啬

起来。“正常一年的实习期，已经有不少人延期到一年半了。”佑洁告诉记者。

入职的前两个星期，实习生卫薇安经历了不少挫折，比如“带教老师给了资料，看不出问题”、感受不到“新行业里人与人之间的界限”等。这个性格大大咧咧的上海女人努力静下心来观察环境，逐渐找回作为“学生”的状态，成功加入了4个诉讼任务。

比不上年轻人的记忆力，但卫薇安摸索出一些有效的学习办法。为了尽快熟悉不同类型的案子，她把同事随口说的案件分析用手机备忘录记录下来储存，还在系统日历上标注了同事有闲暇聊天的时间，提醒自己去听。

“生活经验会帮忙。”卫薇安说，与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的带教律师相比，自己还差得远，但在讨论案件的过程中，过去在地产行业等不同领域积攒的工作经验成为她的优势。

去年年底，卫薇安的丈夫被公司告知工作合同不再续签。“相比4年前，这次我慌了一会儿就定了神。”她说，再过几天会让母亲搬来同住，空出的租房租出去补贴家里的开支。

“面对风暴危机的时候，每个家庭成员都作出了牺牲和让步。”她说。

虽然校园生活和想象中的有差距，但陶佳妍的学术目标逐步清晰。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家庭教育为题，她还将助教实习和研究方向结合起来。

陶佳妍观察到，班里的老师、其他助教都比自己年轻，她对此并不在意，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也会第一时间去做。“我不会介意自己年纪大，做好应该做的，助教工作不存在年龄问题”。

担任助教期间，陶佳妍的工作量不算大，每堂课有400元劳务收入。对她来说，这笔钱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。她来一趟北京，往返火车票加周六晚住旅馆，花费就接近400元了。

“做助教的话，我可以全程听课，不用交学费。”课后，遇上爱聊天的老师，陶佳妍会努力和他们沟通课程内容和自己的想法。她认真计算过，上完全部课程，能听到20位老师授课。

像陶佳妍期待的那样，上课期间，有老师得知她文笔不错，邀请她为课程写培训方案，还夸赞她是“笔杆子”。“我以前并没有接触过相关的内容，但是老师看出了我的用心”。

在受访的3名母亲中，陶佳妍是唯一一个没有“后顾之忧”的。她20岁的儿子正在一所211高校读大二，母子俩偶尔也会谈到各自的校园生活和学习中的困惑。

虽然研一时投过的简历都石沉大海，但今年陶佳妍不再畏怯年龄增长了。“我最近找的工作都没有年龄限制，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做的事情。”

(文中陶佳妍、卫薇安、佑洁为化名)